

暨南新闻传播学人丛书

《向导》周报研究

XIANGDAO ZHOUBAO YANJIU

铭泽 /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向导》 周报研究

铭泽 / 著

XIANGDAO ZHOUBAO YANJIU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导》周报研究/蔡铭泽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8

ISBN 7-211-04809-3

I. 向... II. 蔡... III. 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1927 IV.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0702 号

《向导》周报研究

XIANGDAO ZHOUBAO YANJIU

蔡铭泽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彩虹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市鼓楼区劳动路 12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5.25 印张 2 插页 121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7—211—04809—3
G·2464 定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摘 要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该报于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在武汉停刊，历时近5年，出版201期，载文1474篇（不包括“寸铁”短文），累计346万余字，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和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历史的宝贵而系统的资料，也是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资料。

《〈向导〉周报研究》包括主体和附录两个部分的内容。主体部分是专门针对《向导》周报所做的研究，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第一次面世。附录部分是作者已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包括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和附录四。

从这部著作中可以明晰地看出作者求学、治学的轨迹。作者遵循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路径，进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并注重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学。本书亦是作者在体验我们民族思想解放的全过程中，实事求是、独立探索的心得。

目 录

做学问要迷、疯、静（代序言）	（1）
第一章 关于《向导》周报几个基本问题的辨析	（14）
一、关于《向导》周报的出版发行情况	（14）
二、关于《向导》周报的主编	（17）
三、关于《向导》周报的编撰队伍	（19）
四、关于陈独秀的两个笔名——“致中”和“为人”	（21）
五、关于“振宇”笔名的问题	（23）
六、《向导》周报为何未全文转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	（25）
第二章 《向导》周报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的主要任务及基本 形式的认识	（29）
一、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政治形势及各派的主张 ...	（29）
二、《向导》周报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 质的分析	（30）
三、《向导》周报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和“打倒帝国主义” 口号的提出	（33）
四、《向导》周报对封建军阀的分析和批判	（36）
五、《向导》周报对国共合作的宣传和推动	（37）
第三章 《向导》周报对中国大革命运动的推动和指导 ...	（41）
一、《向导》周报对早期工农运动的指导	（41）
二、《向导》周报对“五卅”运动的指导	（45）

三、《向导》周报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推动和指导	(50)
第四章 《向导》周报对北伐战争的指导	(57)
一、《向导》周报对北伐战争的倡导	(57)
二、《向导》周报对北伐战争的战略指导	(62)
三、《向导》周报对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农村大革命 风暴的引导	(64)
四、《向导》周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军事独裁的 斗争	(69)
第五章 《向导》周报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	(75)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概括	(75)
二、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理论	(79)
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	(81)
四、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	(84)
五、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86)
第六章 评陈独秀的两篇重要文章	(91)
一、陈独秀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91)
二、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分析	(97)
三、关于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形成	(99)
四、对陈独秀两篇重要文章的基本评价	(101)
附录一 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	(104)
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104)
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108)
三、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12)
附录二 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变迁	(118)

一、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经济基础的变迁·····	(118)
二、近代中国农民阶级主体的变迁·····	(121)
三、近代中国农民阶级属于封建社会的小生产者·····	(126)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策略·····	(130)
一、“扩大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策略的提出 ·····	(130)
二、“扩大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策略的发展 ·····	(133)
三、“扩大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策略的历史 意义 ·····	(138)
附录四 论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中国的舆论环境·····	(142)
一、国民党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	(142)
二、多元化的报业结构·····	(147)
三、中国新闻界的冲突与融合·····	(153)
后 记 ·····	(159)

做学问要迷、疯、静

(代序言)

2003年春节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钟茜同学曾采访本人。2004年1月，这篇题为《做学问要迷、疯、静》的访谈录发表于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论典》一书。因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本人成长的经历和治学为人的见解，故略做删节，收录于此，代为本书序言。

走近蔡老师，你能感受到一种朴素而又严肃的气息，不苟言笑的他令人总有几分小心，而那带着湘北方言的口音，让你不得不用心倾听每一个音节。从他目光中流露的坚毅而自信的神采又会令人想去了解一名由农民成长起来的新闻学学者的人生历程。他的每一个脚步都走得如此坚实而稳健，代表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旺盛的生命力，他的成长道路给予我们许多的启发和思考。

孜孜求索 进入境界

钟茜：从您的简介看出，您从历史改行学新闻，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蔡铭泽：从历史学硕士转到读新闻学博士，是偶然的，当然偶然中间也有必然。因为爱看报纸，读书还是非常认真的，每年放寒假、暑假基本上没有回家，就在资料室看书、写文章。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工人日报》、《湘潭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我本科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同时在职攻读硕士，

我当时写的论文就和新闻史有关系了。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又比较爱好文化，我选的题目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份报纸——《向导》周报。这份报纸是共产党 1922 年 9 月到 1927 年 7 月的政治机关报，它实际上是一个周刊。我将它全部看了，做了认真的分析。这个题目是我的硕士导师曹木清教授指导的。曹老师是研究近现代史的，他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又适合我爱钻研资料的特点，就让我写这个题目。这样就和新闻沾上边了。

我对《向导》周报的研究是很认真的，写完硕士论文之后，还发了五六篇文章，我在当时研究《向导》的人中间还算是比较深入的。1992 年 9 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会议，是专门针对《向导》周报创刊 7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他们邀请方汉奇老师和我去参加，我的很多观点在会议上有一定影响。

钟茜：从此在学术领域中崭露头角了吧？

蔡铭泽：也谈不上，或许有一点收获，那就是只要在研究上花工夫，就能研究得比较细，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向导》周报的主编到底是谁？这个历来是有争论的，很多的权威都认为是蔡和森、瞿秋白。实际上根据大量的统计，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蔡和森、瞿秋白都只是某一个阶段的主编。陈独秀的文章占了《向导》周报全部文章的 1/3，他是《新青年》的主编，办刊有经验，用这个经验来办共产党的报纸。只有他才是《向导》周报真正的主编和灵魂。还有，后来成为托派的彭述之也担任过《向导》周报的主编。这就转到新闻史的角度上来了。

我之所以能够到北京上新闻学的博士，就是受了方汉奇教授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精深的学问的感召。我读大学时养成了跑旧书店习惯，经常在那里能发现不少便宜的好书。记得 1986 年暑假，我第一次到北京，在西四旧书店，我买到了一套《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作者就是方汉奇教授。阅读之后，我深

为方老师扎实的史料功底和优美的文笔折服，于是冒昧地向方老师写信求教，居然得到了方老师的回信。一来二往，方老师算是收下了我这个半道出家的徒弟了。有了这种缘分和准备，到1990年考博士，我一考而中，正式成了方老师的入室弟子。这是我继考上大学后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

钟茜：原来有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那您一定不会放过读博士时期在名师指点下全心钻研新闻史的机会了。

蔡铭泽：读博士那几年，在北京认识了很多的老师，方老师、甘惜芬老师、郑兴东老师等，童兵老师也是他们的学生，不过也是我的老师。同时，认识了一大批的新闻界的大家，交了一批的好朋友。另外就是扎扎实实看了几年书，为了写博士论文——《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我当时在北京图书馆踏踏实实看报纸看了一年，抄报纸抄了一年。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是非常珍贵的，一拿就破，因此全部做成了微缩胶卷，要看的话就找一个幻灯机。那时眼睛还没有搞坏，大概抄了六七十万字的笔记吧，觉得很有意思，抄起来也不累。到了一看到“新闻”二字眼睛就发亮的地步！那时营养也不好，中午就是一个面包。全部看完后，就在北京图书馆照了一张相，脸色很不好，没有什么血色。我还是比较用功，没有注意别的，虽然营养跟不上，但还是埋头用功。现在看来对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你看了还得抄，抄了还得想啊。耗费大量的时间，看得鼻孔出血，因为很干燥，没有及时喝水。但是很快乐，没有感到艰难，也没有感到困苦，应该说论文做出来还是比较扎实。在人大历届博士生的论文中间，好不好就不说了，肯定有人比我做得更好，我的论文是写得非常认真、写得最厚、篇幅最长之一。

钟茜：学问有“活学问”和“死学问”之分，您做的基本上属于“死学问”一类，不觉得枯燥吗？您是怎样把“死学问”做

活的，有什么方法吗？

蔡铭泽：学问并无“死”、“活”之分，只有“显学”和“隐学”之别。而“显学”和“隐学”又是相通的，都要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在人大读博士期间，感觉到积累了一点做学问的方法。有的时候要在材料中间找材料，一个材料反复运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加以运用，这也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充分地用活、用透。搞学问也是这个样子，有材料的话就精挑细选，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就左右印证。对于一个经典的材料特别要吃透。这样篇幅也上来了，深度也下去了。比如说对国民党党报的发行，有内部的档案资料，党报的发行、分布情况都有。我把国民党党报发展过程中各个省、各个地方，有哪些国民党的党报、有哪些人在办、在哪里办、多大的规模、多大的影响、发行量多少整个掌握，将所有的资料列起来做一个表。那很不容易啊，非常准确。这个表起码花费我十几天的时间，对它的分析就显得很重要了。从时间发展的情况来看，哪段时间发展得多、哪段时间发展得少、是由哪些人员推动的。从地域分布的情况来看，东部多、中部少、西部就是零零落落，这个说明了什么？这和整个中国发展变化，国民党的势力所达到的能量有关系。为什么东北没有？因为抗日战争是从东北搞起，国民党在这里没实力。西北也不行，因为西北文化落后，办了也没有人看，且那些老军阀也不希望你在那里办报。东部上海、南京由国民党掌握，但是人家不买账，人家有《申报》、《新闻报》，还有共产党的报纸，也有外国人办的报纸，虽然花了很多功夫，但效果不太好。国民党在河南、湖南、江西、四川这样的地方办的党报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半开化，封建的东西很浓厚。半开化的状态，资本主义的观念大家也接受了，而且又处于一些交通线上，新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是搞政治的，要和

共产党斗争，所以他的新闻事业办得很发达、很有效。反过来，这就决定了国民党的性质及其党报的性质——就是代表乡村的豪绅，代表新生发达的官僚资本，这样的人需要控制政权，并且用新闻事业加以巩固和推进。一个表格做出来，就可以得到很多。我心中有很多的题目可写，我对这些题目都能够把握，现在我有了一点生疏了，毕竟搞行政搞得久一些。我的底子是在北京打的，这几年比较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是有一些进步。

大家都在做学问，那么究竟什么是搞学问的，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做学问的门槛、境界？我提出了三个字来衡量。一个就是“迷”，入迷，有兴趣；一个就是“疯”，发疯的疯；一个是“静”。“迷”，首先是整天想着看着这个东西，哪怕再枯燥无味，也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向往，那你就有动力。把枯燥的东西变得鲜活，变得值得为它付出，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没有这个态度，不爱这东西，那就钻不进去，是很苦的。为什么寒暑假我都不回家？为什么在北京图书馆抄资料抄得口鼻流血，脸色惨白不觉得？因为我全身心投入，感到很快乐。如果我感到不快乐，觉得是负担，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小时也难以做下去。第二个就是在接触大量的资料、现象以后，就有一些想法，这里面就是有一些思想的闪光点。思维的火花来去都是很快的，一下就跳出来了，你想得天花乱坠，你如果懒惰，不管它，它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完了、湮灭了。如果将思想的火花记下了，一下就能想到，这就是学术的灵感。一个人如果不能激发自己的灵感，就没有学术的创造力。在学术中间要大胆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我的做法就是“逢人便讲，逢鬼便说”。所谓“逢人便讲”就是说在我的同行、懂行的人面前大谈特谈。“逢鬼便说”是指碰到外行人，他什么都不懂，在讲的过程中他不会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但他可以听。在一遍一遍复述的过程中，就进行了自我的

抽象、思维的整理。第三个“静”代表的就是一旦发表了文章，就保持一个安定的心态。如果到处说那是我的文章，狂妄自大，就不行，那大家就讨厌你。应该是“静如处女细无声”，像害羞的女孩子一样，怕跟人家讲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学术报告会上该你讲的时候，大胆地讲，大胆地发表文章。假如认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那是非常浅薄的。做学问和做人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人聪明但是狂妄，不会把握自己还是不行的。

以史为鉴 谈古论今

钟茜：您在早期是研究新闻史的，那么，通过借鉴历史，您对现今广东新闻媒介的改革有何评价？

蔡铭泽：我到广东来以后，发现广东新闻改革在两个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可能对全国新闻改革会有推进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要发展，政治体制要改革，社会要走向民主和法制，这是不可阻挡的，这就要求新闻做出相应的改革，就不仅是业务的改革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连新闻理念和新闻管理体制也要改革。一旦加入 WTO，不改不行。突破口在哪里，我在广东看到了两个希望，一个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质询制度，质询是人大的一种活动形式，广东省人大代表在 1995 年开人大的时候就将国土厅长和交通局长找来，要求他向代表们交代为什么不执行省人大的立法，为什么修高速公路那么缓慢，为什么有那么多贪污腐败？因为用人大来介入政府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人民代表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也是共产党认可的，开会是完全符合程序的，然后新闻媒介的介入将政治的民主变成了媒介的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样广东的新闻媒介走在前面。根据我目前所掌握的情况：1993 年，利用新闻媒介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这是媒介舆论监督的环境改善，这已经是一个突破了。1999 年，广东省

召开人大会议，省人大代表在会上质询“电镀厂环境污染”的问题，省环保局长解释一次不行，解释两次不行，会上气氛紧张、严肃得很。由此我想到广东是以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著称，从而推动全国的发展，它的贡献在这里。新闻改革这一点，广东的新闻界将给全国的新闻界做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我非常肯定这一点，我们的新闻已经从新闻批评进入到舆论监督的阶段，舆论监督落到实处，通过人大的介入，新闻界和人大的紧密联系和社会热点的有机结合，新闻媒介的力量显示出来，新闻改革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广东最近的非典型性肺炎的事件。这个事情是去年十一月份就有了，《南方都市报》和《羊城晚报》也发了一些消息，很多消息不让他们发。中央领导对广东进行长篇批示，随后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个事情是意想不到的问题，它不是政治风波，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严重社会动乱。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次问题的出现是对广东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的一次重要的考验。能不能过关？能不能经受住这一次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冲击？广东的经济能不能挺得住？政治民心的稳定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媒介能不能承担起风险的防范、预警和谣言的消除这些责任？开始媒介是被动一点，后来变得主动。由此广东的新闻界又为全国的新闻界找到了第二个突破口，那就是让老百姓知道，满足老百姓的知情权。可以查查这几天的报纸，我写了篇《广东十日观报记》，就是专门说这个问题的。当这个重大的灾害、疫情与老百姓切实相关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发生以后如何及时地预报，让老百姓知道；如何教老百姓防范；当敌对的言论、舆论、谣言出来以后，如何把它消灭抵制，让社会走入正轨？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啊！这次我想广东的新闻媒介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样就为全国新闻改革的深化找到了第二个突

破口。

钟茜：您的研究思路越来越从历史层面靠近现实层面？

蔡铭泽：对。你们不要看不起历史，历史就是刚刚过去的现实。如果一个人历史知识为零，那么他的一切都为零。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一门知识，那就是历史。”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人类是如何过来的，各门科学都有它的历史，如果说刚刚过去的事实你都不知道，那么你有的知识仅仅是眼前那一点点，那也是为零。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说，历史就是一些古的东西，我就钻到甲骨文中间，钻到故纸堆中间搞学问，那也是不行的。历史毕竟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和现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好。

你们也要看历史，《资治通鉴》我看了很多遍，比较熟悉，很有意思，也和新闻有关系。比如“安史之乱”，潼关失守以后，西安保不住了，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和皇子皇孙在禁卫军队保护下逃出去了。逃到马嵬坡那里，没东西吃了，形势非常严峻，只好把杨贵妃杀掉，没办法啊，战士不愿走啊。当时有一个老头跟他说了一番话，就跟我们新闻有关系啊。他说我知道过去宋璟当丞相的时候，因为丞相能够敢言，天下太平长达数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老百姓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皇帝也能够改进，天下就靠这个东西安定了几十年。那现在不行了，杨国忠上台以后，你只听好话，不听坏话，下面人的意见上不去啊，我们很着急。今天的混乱每一个百姓都知道要发生的，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言路不通。这个跟新闻就有极大的关系啊。这个就是历史，假如我们现在意见渠道不畅通，老百姓不知道，那怎么行啊！

与时俱进 事业创新

钟茜：在您学术道路上，曾经遇到多位良师吧？

蔡铭泽：在我的发展历程当中，一共有三位老师帮助过我。一位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曹木清教授，他是从武汉大学调到湘潭大学去的有名的教授，是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另一位就是上海师范大学的郭绪印教授。他看了我研究《向导》、研究陈独秀的文章后，很赞同，主动和我联系，我就跟他进行学术方面的交流。现在，他们两位已经退休了，但我对他们是非常尊敬、非常感激的，他们对我的帮助令我终身难忘。另外呢，就是方汉奇教授。

钟茜：方汉奇教授是中国研究新闻史的权威，您是怎样和他联系上的？

蔡铭泽：前面提到，1986年因为读书写论文的关系，我有机会到北京去了一趟，在旧书摊上买了方老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之扎实。买回来后，我认真地看了看，觉得方老师的学问做得实在好，研究报纸也很有意思。当时我不清楚他究竟是人大的还是北大的。后来打听到只有人大有新闻系，北大原先有，后来撤掉了。我就试着给方老师写了一封信。说我买了他的书，看了之后受到影响，想报考他的博士，想从事这个研究，想跟着他一直学习下去。方老师热情洋溢地写了一封信，鼓励我。这样，我就和方老师联系上了，而且至今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一直帮助我。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家庭负担，三十几岁的人了，也没有考虑到家里还有多少钱，还要离开新婚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真是不可思议。这大概是一种对学问的追求和精神的支撑，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钟茜：原来蔡老师研究新闻史几经波折，和方老师结缘是在旧书摊上的。当时没有考虑挣些外快？

蔡铭泽：那个时候从来不打工，也没有谁要我，也没有打工这一说。后来我到北京去，有很多打工的机会，我也不打。我想

那几年的读书时间是很宝贵的，你打那些工干什么。打工就是剪刀加糗糊，拼凑一些骗人的书籍，赚点可怜的稿费，但也能解决一些生计问题。我因为没有打工，所以一直比较穷，但我安贫乐道，物质享受追求不高。

钟茜：您是方老师的第几批学生？

蔡铭泽：我去的时候，方老师已经带了一些博士生，有的已经毕业了。方老师带的第一批博士是尹韵公和郭镇之，接着就是胡太春和杨磊，我是第三拨。我考的时候，竞争不是太强。不像现在大家都去考研究生、考博士。当时的谚语是“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谁去考博士啊，要说竞争是和自己竞争。但还是竞争的，我考的时候一共有5个人考试，录取了我一个。他们都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应该说外语等各方面的基础比我好，但方老师还是录取了我。为什么我能够考上？我改变现状的愿望比较强烈，可能这是一个原因，所以方老师的选择改变了我的人生。

钟茜：您觉得从您的恩师方老师那里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蔡铭泽：方老师直接从知识上灌输给我的东西不是很多，我也听他的课，但不是专门为我开的课。主要还是从他的书上得到教导的。

方老师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他那种非常谦和、达观的人生态度。方老师出生于官宦之家，这个出生背景和我完全不一样。方老师的父亲解放前曾经是汕头的市长，兄弟姐妹众多都很有出息。解放后，他们家庭的成员基本上都离开了大陆，就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虽然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背景，但是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只受到一些冲击，没有直接的大冲击。这和他的性格谦和及为人友善关系很大。他能够招福能够避祸，对一切东西看得非常透彻，不认真去计较，心胸非常之宽广。这是他对我的影响